

达拉滩农村改革第一人

文/《内蒙古日报》记者 李文明

鄂尔多斯市达拉特旗最南端起伏的丘陵沟壑间,一座掩映在绿树旁的小院格外引人注目。6间楼板房,墙面被白色瓷砖罩得严严实实,宽大的院子里铺设了大理石地板,收拾得干干净净。

这座院落的主人是陈绿师。他的母亲就是40多年前在全国率先进行包产到户的赵丑女。这个村子是达拉特旗树林召镇城塔村,也是原来的耳字壕人民公社康家湾村。

见到陈绿师时,他和妻子刚从玉米田里除草归来。安顿记者一行人到家中坐下,陈绿师便讲述起40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那场重大变革。

“那时我只有十几岁,还在学校读书,放假回来还要帮母亲种地。”陈绿师说,赵丑女所在的康家湾村位于达拉特旗最南端,依靠着黄河的灌溉,从清朝晚期走西口以来,就是内蒙古重要的粮食产区。40多年前,康家湾与其他地区一样,也是实行“大呼隆”生产方式:农民们每天听生产队干部的哨子上工、下工,集体劳作。除了大年三十和年初一两不用下地干活,所有人所有的时间都被束缚在土地上。

虽然赵丑女家附近就有一片生产大队的耕地,但

她每天仍然要来回走较远的路,先集合,再出工。当时50多岁的赵丑女看不下去这种“光跑路,干不出活儿”的生产方式,便向队委会提出把离家近的那片地让她种,她“每天走路的工夫就可以把那儿地给拾掇了”。

“队里当初主要是为了照顾她的年纪比较大,就答应了她的请求,把离家最近的那14亩地以及两台水车、一头骡子交给了她。”时任生产大队队长的韩子义回忆说,当时包给赵丑女地是出于对她出工不方便的考虑。“这里十年九旱,地广人稀,许多地方不成村落。赵丑女家住在后山的梁上,去集体的地头来回出工得花一个多小时时间,队里就允许她包14亩地,后来发生的事情是谁也没有想到的。”虽然已经年逾八十,韩子义对当时的情况还记忆犹新。

康家湾村当初的决定还不能叫做“承包”,因为生产队只是将那块地的耕种任务单独交给了赵丑女。收成还是全部归集体所有,仍然按照工分计算,只是她的工分不是按出工时间计算,而是参照集体劳动耕种一亩地需要多少工时给她打分。但赵丑女却对这块“由自己种”的土地倾注了极大

的热情。“我母亲种地可下了辛苦,起早贪黑侍弄庄稼。”陈绿师回忆说。

1973年的秋天,康家湾村集体劳动的地每亩只收了500来斤,而赵丑女耕种的地粮食亩产却上了1000斤,收成翻了一倍,她一个人共向队里上交了1万多斤粮食,大白菜、大蒜的收成满足了整个生产队的需要。“秋收后,赵丑女家的人均收入比整个生产队高出了几倍。但是,在分配劳动所得时,却发生了很大的争议。赵丑女能够多打下粮食,但是仍然参照集体劳动给她记工分,她就明显吃亏了。队里很快就商量出了一个‘以产量定工分’的办法,即以一定的产量给赵丑女定工分,如果赵丑女第二年还能超产,就把多余的产量折成工分奖励她。”韩子义说,后来,此种方式被总结为“以产定酬”。由产量而不是“出不出工”作为考核方式,进一步激发了赵丑女的生产热情。

很快,从第二年开始,赵丑女的辛勤劳动有了回报,她种的14亩地收成多,为她折算的工分多,她最后得到的粮食自然就多了起来。

1976年,一篇描写赵丑女主动“包产到户”,解决自己吃饭问题的文章在《鄂尔

多斯日报》发表,引起了轰动。当年,康家湾又率先实行起了“包产到组”,模式便是参照赵丑女的方式:生产队分成3个组,给每个组定产量,超产部分折算工分,再根据工分分配粮食。1978年,当人们争论不休又拿不准调的时候,康家湾村就率先实施了更彻底的包产到户。邻村赵家梁,看到康家湾村实行了包产到户,也尝试着包产到组,一年下来全社的收入翻了6倍多。那年春节,丰收了的村民们开始挨家走串喝酒庆祝。

回忆往昔,陈绿师和韩子义历历在目,如数家珍。

沿着农村改革发展的轨迹,陈绿师也享受到了改革的红利。

“1997年,国家第二轮土地承包制实施,农村土地承包期限由15年延长至30年。从那时起,我们思想更活了,也更舍得投入了。”陈绿师说,在“五荒”开发“谁建设、谁管护、谁受益”的政策激励下,陈绿师家又开发了几十亩水浇地,耕地总面积增加到100多亩。

2006年,农业税全面取

消,农民彻底从土地包袱中解脱出来。“现在,我们不仅不用交税了,国家还给我们发粮食直补、粮种补贴、农机补贴、退耕还林还草补贴、农业保险补贴等。现在种地用机械,一百多亩地从种到收,自己也不用出多少力。”陈绿师笑着说,今年,他家陆续购置了拖拉机、翻地机、播种机、土豆收获机等机械设备。现在仅靠种地,陈绿师的纯收入就有十多万元。

今年60岁的他继承了母亲勤劳朴实的美德,整天闲不住。从陈绿师家到院子有一公里多路程,他时常过去看看40多年前母亲承包的那片土地。今年,他盘算着在那里建设几个暖棚发展蔬菜种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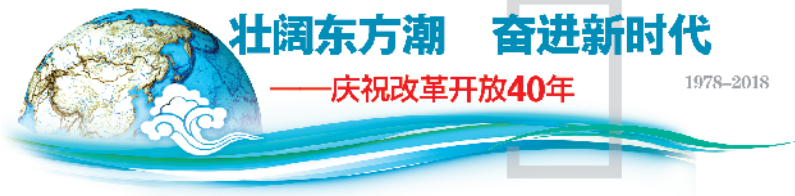
【记者手记】 跑好改革“接力赛”

一位名叫赵丑女的普通村民,当初只是为了能节省来回往生产队里跑的时间,而请求生产队允许她单独耕种离家最近的一片土地,竟无意中触及了当时最急需解决的农村生

产方式和分配方式问题,她的成功又无疑给后来的农村包产到户开了先河。赵丑女在耳字壕公社激起第一朵农村改革浪花,在达拉特旗,乃至鄂尔多斯市逐步改变过去的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人斗的发展方式,迅速掀起一轮又一轮新的改革浪潮。

40年来,改革如同黄河的波浪,一浪接一浪。我国广大农村地区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巨变,无数农民也大踏步跟上了时代。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吃不饱、穿不暖到现在年纯收入破十万,赵丑女一家切切实实分享了改革成果,让农民活得更更有尊严,也让农民越来越有话语权。

40年前,“大包干”精神成就了“小岗梦”。如今,实现农牧业的现代化、农村牧区的繁荣发展、农牧民的全面小康依旧是农民的期待。现在,“塞外小岗”乃至整个内蒙古都在以这样的精神,持续推进农村改革,跑好改革这场马拉松的接力赛,努力绘就亮丽的祖国北疆风景线。



孙津川:革命者是杀不完的

新华社南京6月3日电 (记者 邱冰清) 长夜群星,璀璨天地。在南京的雨花台烈士纪念馆“长夜星空”展馆中,可以看到用多媒体投影呈现出的烈士英姿,与LED灯营造出的星光交融,象征每位烈士散发信仰之光,闪耀在革命道路上。

孙津川就是这“漫天星光”闪耀革命道路中的一位烈士。1895年,孙津川出生于安徽省寿县一个工人家庭。14岁起先后到南京、上海做工。1924年秋,孙津川在上海与中共党员彭干臣相识,并在其影响下走上革命道路。

1925年8月经彭干臣等介绍,孙津川加入中国共产党,并当选为沪宁铁路工人

协进会委员。不久,中共吴淞机厂特别支部成立,孙津川被选为特支书记。

为配合北伐军进攻上海,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举行工人武装起义。1926年10月,孙津川按照党的要求,带领吴淞机厂工人武装切

断沪宁铁路,破坏北洋军阀的后勤军需补给线,为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创造条件。1927年3月,孙津川领导吴淞机厂工人举行大罢工,揭开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序幕。3月28日,孙津川被选为沪宁、沪杭甬

两铁路总工会委员长。

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,孙津川往返奔走于武汉、九江、上海等地,代表全国铁路总工会接待和安置苏、浙、皖、赣等省的流亡同志,秘密整顿并恢复各地铁路工会和党组织。

党的八七会议后,孙津川被党派往南京担任中共南京市委书记。在极其严重的白色恐怖中,他着手整顿党的组织,传达八七会议精神,发动和组织群众,坚持地下斗争,准备武装暴动。

1928年7月,孙津川因叛徒告密,身份暴露而被捕。在狱中,国民党军警特务妄图用高官厚禄和酷刑

逼迫孙津川交出党的机密和南京地下党的名单,但遭到坚决拒绝。被打得遍体鳞伤、奄奄一息的孙津川坚定地对敌人说:“要杀就杀。枪毙我一个,还有十个;枪毙我十个,还有百个。千千万万的革命者,你们是杀不完的!”

1928年10月6日,孙津川一路唱着国际歌,高呼着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,英勇就义于南京雨花台,时年33岁。

“大伯在我心里是个顶天立地的英雄。1928年他在雨花台牺牲,他对党的信仰和忠诚为我们整个家族树立了光辉的榜样。”孙津川

烈士的侄女,年过八旬的孙以智老人说,希望当下的青年一代明白今天的一切来之不易,不要忘怀烈士们为此奉献的青春与生命,让烈士精神代代相传、生生不息。

孙以智老人从47岁时开始担任南京市雨花台区实验小学校外辅导员,给孩子们和雨花台参观者讲述烈士故事,已坚持了38年。每年清明节,是她最忙的时候,她要带着孩子们去雨花台扫墓。雨花台松柏环抱,来访者都会在烈士纪念碑前看到一块铜质铭牌,上面镌刻着:我们和我们的子孙会常来这里……



孙津川(资料图片)

为了民族复兴·英雄烈士谱